

第一章 在新的历史选择中诞生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

中国文学批评史曾经是一门新学科。它是五四文学运动的产儿。年长时久，学科史初期所闪耀的新变锋芒，渐渐地收敛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门学科形成了自己的结构模式和方法系统，标志着它的充实和成熟。同时，这也导致了学科体系过早地自我封闭。钱钟书说：“文艺批评史很可能成为一门自给自足的学问。”^①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确实出现过这种局面。造成这种停滞的原因是复杂的，原因之一是建国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间中现实文学运动轨迹的变形，以致使许多严肃的学者无所适从。当时的现实文学运动对这门学科也没有多大的需求，于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间应有的互补结构被损害了。学科的发展失去了内在和外部的动力。这样，超稳定的学科格局使它很难吸收、消化新思想和新方法。学科理论结构的陈

①《旧文四篇·中国诗与中国画》。

旧，不但吸引不了青年学子，而且连老学者也缺乏了原有的创造热情，他们终于去专致于文论史料的整理和考证。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文论史料的整理和考证自有其意义和价值。但一堆史料的堆积不可能成为科学，何况整理和考证史料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研究，而不是取代研究。这种局面的扭转则是最近十年。可以说，这十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一次重要的转折和新变。

温故可以知新。回顾一下学科诞生时期的一抹辉煌曙色，回顾一下学科开拓者向传统挑战、拍击时代潮流的风姿，从中引出一些经验和教训，这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者和当代文学理论建设者，都将是有益的。

第一节 难以超越的时代门槛

中国传统的诗文评历来附骥于集部之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结得很清楚：目录学家之所以要别立此门，仅仅是为了“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①而有裨于文章而已。四库全书总纂，被誉之为“第一个有文学批评史的自觉”^②的纪昀，他的批评史观念较之同时代的文论家明确得多，因为他毕竟见多识广，长于比较。他很自负：“诗日变而日新。余校定《四库》，所见不下数千家，其体已无所不具。”^③他居然还“以文学批评

①《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四十八·诗文评类一》。

②《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第552页。

③《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诗钞序》，《纪文达公遗集》卷九。

史策士”。①结果呢，三场考试，四千考生中能应答者仅一而已。在编写诗文评论著提要时，他手中的尺度把握得很紧、很严，举凡有根柢的考据、采掇精审的品评、可资考核的纪事，纪昀都鉴裁分明，批评合度，而对某些有争议的、理论思辨力较强且有创见的论著，纪昀或者持中庸之道，说一句“誉者太过，毁者亦过”了事，如对严羽的《沧浪诗话》即是；或者贬多于褒，如对叶燮的《原诗》，认为其“词胜于意，虽掇纵横博辨之致，是作论之体，非评诗之体也”，②而且仅把它列入“存目”。

由此可见，时代的局限确实是一通很难超越的铁门槛。清代诗论家管世铭说：“文章虽限于时代，豪杰之士终不为风气所囿也。”③这只是从独创角度观察文学现象的一般认识。如果要从文学的时代性方面判断，那么任何一个文艺家的文学观及其价值观念很难超越一代文学思潮运动的水平。模糊的预测是可贵的，但毕竟是一种预测，不能混同于现实发展的实际情势。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不为风气所囿、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文评家，几乎代各有人，他们的反传统的叛逆之声至今闻之尚使人振神启智，然而他们的观念及其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无不受着时代思潮的制约。就此意义上说，文艺家的理论个性色彩中也有着时代的投影和折光。

就说叶燮吧。他的《原诗》获得了理论批评史家和美学史家的崇高评价，认为它具有严密的唯物主义的美学体系，且富有近

①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302页。

②《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四十八·诗评类一》。重点号为引者所加，本书中凡未注明原有者，均同此。

③《清诗话续编·谈雪山房唐诗序例》。

代、现代的意义，与王夫之的美学体系并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丰碑。学者们很有感情的礼赞确实富有感染力，不失为一家之言。但似乎也应该指出，叶燮同样具有鲜明的儒家正统的观念，以及“天不变、道亦不变”和“天道无二”的哲学思想。从叶燮的天道观和历史循环论观念中，可以发现二千年前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型范。笔者认为，叶燮《与友人论文书》中那些带有根本性质的观点是不应该被忽略掉的。比如，他认为：“夫文之本乎经者，袭其道，非袭其辞。”还说：“盖天下古今只有此一道，千差万别，总不可越”，并且断言：“即天下有自成一家之文，断无有自成一家之道，若有自成一家之道，天下古今岂有二道乎？”具体地说，他对六朝哲学、庄、列、司马迁等人都有微辞。庄子《外篇》“叛道尤极”，“不可谓是而已”；“司马迁之文，固知尊尚六经，然徒能貌其浮廓耳”，只是因为“其志则道”的缘故，才承认他为一家。叶燮激烈地批评说：

“且庄、列、司马迁之文，为之周、秦、汉以前，创辟之人为创辟之文，称作者可也。若后人踵而为之于今日，则何异于刍狗，何况等而下之者乎？”①

其实，叶燮的文道观不但没有近代、现代的气息，甚至还比不上袁枚的叛逆之声。指出这一点，不但无损于《原诗》的文论和美学价值，相反，有助于理解《原诗》中浸润着的历史循环论的思想本源。指出这一点，也不是为了苛求叶燮，只是说，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到来之前，即使象叶燮这样一个很有理论思维能力的文学理论家和美学家，要想啄破紧裹在他思想体系外部的那个僵化、保守、荒谬、迂腐和充满神学色彩的坚硬外壳是多么的

①《已畦集》卷十一，金闾刘刊本。

困难。明末诗人、散文家王思任说得是：“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①

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事实昭示：即使是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曾经占统治地位的旧文学观念及思维方式还可以维持相当长一个时期的独立运行能力，保持其相对平衡状态。否则，就很难理解下列现象：在《申报》创刊的第二年（1873），刘熙载完成了他的谈艺名著《艺概》——耐人寻味的是，最后专列一“概”《经义概》，即“八股文指要”；在维新变法思想盛行之际，同光体的诗论家陈衍还写就了颇有影响的古色古香的《石遗室诗话》；在具有近代意义的诗界革命热潮中，一尘不染的常州派词论家们正精心地撰写着属于纯粹古典文论范畴的《白雨斋词话》和《蕙风词话》；甚至在新文学革命运动开始之后，“桐城谬种”成为批判对象之时，恪守桐城义法的姚永朴还写了专门与“西文艺学”相颉颃的《文学研究法》——一部颇能演义桐城文派论文旨意的系统专著，此书在三十年代初还颇派行，可见其影响之一斑。

凡此说明，新旧文学观念的交替需要有一个过程。至于这个过程时间长短及其消长趋势，还是离不开整个社会思潮构成成分、色彩、基本性质及其流动方向。具体地说，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的发展，依然受制于中国近代的社会思潮的变动。这一个时期思想史呈现出了极其驳杂的色彩：中西杂糅，新旧掺半，古今分流；旧观念的躯壳与不成熟的新思想并存，传统的朴素唯物主义形态与近代进化论相结合。总之，在这个充满忧患、充满矛盾的新旧交替时期，正酝酿着一次划时代的文学革命，只有到了这个阶

①《王季重十种·唐诗记事序》。

段，文学理论批评才从传统的重压中突破出来，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在现代文艺学中取得其独立的位置。

第二节 一门新学科的诞生

五四新文学运动出现过一种值得作专门研究的深刻现象，即是对文艺理论的普遍需求和广泛兴趣，用一句时行话说，就是“文艺理论热”。这种“热”不只是热一阵子，而是持续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朱自清说：“新文化运动以来，文艺理论的介绍，各新杂志上常常看见；就中自以关于文学的为主，别的偶然一现而已。”^①当时凡有影响、有建树的文艺家，几乎都在文艺理论领域内留下过深深的足迹。大宗的现代文学库藏中，时时可以检索到他们的文艺理论著作。这是一种只有文学奋进时代才会出现的精神现象，是五四文学大潮中具有特殊作用的一股思潮，是当时处于大变动时期的中国社会对理论热忱渴求在文艺方面的表现。当时的文艺学者一方面广泛地介绍西方新文学观念、流派、理论和思潮，另一方面则对固有的传统观念挑战、重新评价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观念在内的全部文学遗产，寻觅着沟通新旧文学的途径。他们重视对西方文艺思潮的汲纳，因为这是他们赖以评价传统的理论武器。杨鸿烈在阐述他编写《中国诗学大纲》的指导思想时就直言不讳地说：“所以我们现时绝对的要把欧美诗学书里所有的一般‘诗学原理’拿来做说明或整理我们中国所有丰富的论诗的材料的根据，这就是本书以下几章所要努力

①《朱自清序跋书评集·〈谈美〉序》。

的事了。”^①此书写就于1924年。当时的学者引进欧美文艺理论的目的是为着建立中国自己诗学系统。他们怀疑、批判、否定旧传统，目的不是为了抛弃民族文化遗产、割断历史，而是为着开创新文学，形成新传统。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氛围中，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开始出现了繁荣局面。这笔尘封已久的古老的文论遗产逐渐地呈现出了固有的、却是新发现的理论价值及其思维异采。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创编，就体现了西方文学批评观念和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新揉合，反映了当时学者沟通新旧文学的强烈意愿。他们一边在故纸堆中爬剔，一边却“随时都希望能说明一些文坛上普遍的问题，因为普遍的问题自然就与新文学特殊的问题有关”。^②中国不但是诗国，而且也是史国。史的意识强烈地渗透在我国文化学术思想的各个方面，以史为鉴是我国学术文化思想的优良传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创编是与中国文学史繁荣分不开的。朱自清曾经解释过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文学批评史不止可以阐明过去，并且可以阐明现在，指引将来的路；这也增高了它的趣味和地位。还有，所谓文学遗产问题，解决起来，不但用得着文学史，也得着用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得相当快，这些情形恐怕都有影响。”^③一个新的选择的结果是一门新学科的诞生。

这门学科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在当时正是一批勇于接纳新思潮的中青年学者。刘永济、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

①《中国诗学大纲》第31页，商务1928年版。

②《朱自清序跋书评集》第119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③《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44—545页。

东润等前辈学者，都是对文学理论采取开放性眼光的探索者。今天的年轻学者往往会有一种错觉和误解，认为前辈学者都是一生尘封在故纸堆中、蜗居于象牙塔里的书斋大师。其实，他们也经历过伟大的改革时期，在新文学运动中曾经表现了一种生气勃勃的革新精神。

他们都关注现实文学运动、观察世界文学潮流。回顾一下郭绍虞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开端别有一种深长的意味。读一读连载于1920年夏秋间《晨报》副刊的《艺术谈》可以大开人们眼界。九十八则随笔十余万言的文章广泛述评了彼时世界艺术和美学思潮中的主要流派、人物及其观点，其中大部分资料都是郭绍虞直接从外文译介于世人的。且看出现在《艺术谈》长廊中的下面一长串名字吧：“蓝逊（Lessing）、费希脱（Fichte）、潘罗典（Plotinus）、拿尔逊（J.S.Knowlson）、斯宾塞（Spensen）、卢梭、莫理斯（William·moris）、哈脱孟、黑格尔、泰戈尔、托尔斯泰、尼采、马克思、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雪莱”，①等等。同年，郭绍虞还在《小说月报》上撰文介绍俄国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等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观点。因为作者认为：“只有批评家能别有创见，脱去旧式的批评，以从事于新运动，才可使艺术一换新面目。所以批评家应得站在艺术思潮的前面作适当的指导，切不可使其思想为旧形式所束缚，使艺术永陷于蹈袭的境地。”②其时，

①参见《照隅室杂著》第1至1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为节约篇幅，译名一仍其旧，英文原名照录于此，不另注释；排列也不分时代，仅以原文次序。

②同上，第80页。

郭绍虞27岁。他先是新潮社社员，嗣后又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之一。作者在译介欧美文艺思潮时，时时把它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艺术观、美学观作比较。这种开放意识在其他批评史学者的论著中也可以普遍地见到，尽管这种批评意识的哲学基础主要还是西方的进化论。在1926年已刊行了四版的刘永济的《文学论》同样如此。这是一部初具系统的文学概论。刘永济《文学论》的一个最大特色便是把中国传统放在一个世界文学情势中进行观照。他认为，古今中外文艺家的文心是相通的。他在自序中说：“其有参稽外籍、比附旧说者，以见翰藻之事，时地虽囿，心理玄同，未可是彼非此也。”^①可见，早期学者在创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前是有着一个充分的理论准备阶段的。他们意识到：“选择也就是批评”。^②要选择，就得放开眼光，广蓄博采，面向世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观照的参照系统常常是以欧美文论为座标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当时中国学者手持的、唯一可以与传统挑战的利器。百川竞流，难免异端遽起；大江奔流，必然灵蠢俱下。这正是理论思潮高涨时期的情势。在精芜杂陈的现代西方文论面前进行批评的选择，需要有自信力和思辨力。早期批评史学者一边摸索、一边营造一把能开掘民族传统文论价值的尺子。老舍在1930至1934年间也编写过一本《文学概论》讲义。他说：“现代治学的趋向，无论是研究什么，‘科学的’这一名词是不能不站在最前面的。”又说：“我们要读古籍古文；同时，我们要明白世界上最精确的学说，然后才能证辨出自家的价

①《文学论》第1页，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②《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第4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值在。”^①在科学的文艺论引进之前，前辈学者们这种迎着欧美风雨探索、奋斗的精神，是值得礼赞的。

第三节 早期批评史研究的“新工具”

早期学者在沟通中外、古今文论的历史联系上花了不少的功夫。现代第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者陈钟凡就作过这种努力。对这本仅数万言的批评简史，时人和今人的评价偏低，这欠公正。作为一门学科的奠基者，他至少必须设计一个理论模式，而且是一个既不同于传统文论、也有别于文学史的新模式。这本身就是一个开风气的贡献，直接影响着后来学者的研究。幸而，在这本简史的前二章有一个反映编者意图的纲目。他认为，中国历来对文学的界说，自南朝而严，以后纷起的异议没有太根本的分歧。因此，采取“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的比较法。他引证了德国批评家维尼、英国批评家安诺德、美国批评家亨德诸人关于文学的界说，然后下了一个折衷中西的文学定义：“文学者，抒写人类之想象，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②进而，他比较中外批评观念的异同，并揭示了全书的方法论基础，在逻辑上他取归纳、推理、判断的批评，在结构上他取历史的批评方式，因为历史的批评重视知人论世，不同于一般道德的、审美的、印象的、欣赏的批评。陈氏的标举并不精审，而且在概念上有些混淆。但这种努力却是可贵

①《文学概论讲义》第2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②《中国文学批评史》第6页，中华书局1927年版。

的，反映这本批评史新的时代色彩以及作者彼时的“当代意识”。不少学者都作过这种努力。如刘永济对文学下的定义是：

“概括言之，则文学者乃作者具先觉之才，慨然于人类之幸福有所贡献，而以精妙之法表现之，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之事也。”^①初看有些不伦不类，细察才能窥见其中浸润着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把人道主义精神与温柔敦厚诗教揉合在一起，至少也是显示作者的文学功利观。

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是很有特色的一本批评史著作，出版于1934年5月。作者十分推崇“中西思想之互照”的“比较文学批评学”^②研究方向。作者的认识颇深刻：“百年以来，一切社会上思想或制度的变迁，都不是单纯的任何一国的问题；而且来自文学批评家的眼光，或广或狭，或伸或缩，都似乎和文学作品的范围互为因果，眼中所看得到的作品愈多，范围愈广，他的眼光，也从而推广。所以，‘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③

沟通古今、中外文论之间的联系，这不只是一个方法、视角的转换，而是一个观念变革的问题。古与今、中与西之间，即传统与现实、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艺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冲突和矛盾。正是在这种冲突和矛盾中，显示出了各自面目的真相，在比较中反思，在反思中清醒地重新估价历史和传统。早期批评史研究中出现的以欧美观念为基准去衡裁传统、评估传统的现象，较之近代以来在“中学为体”意识笼罩下把一切新的思想观念全都说成古已有之的痼习无疑是一种进步和飞跃。因为前者是

①《文学论》第21页，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②③《中国文学批评》第227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显示了学者们正视现实，面向世界新潮的勇气——尽管它失之偏颇和幼稚；而后者则是闭着眼睛、拒绝一切变革的倒退立场。对此，朱自清有过一个总的概括：“‘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①早期学者们沟通古今、中外之间联系的结果，便是对文学特性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对文学本体研究的内容比较清楚，对传统文论评价的尺度也比较客观了。

第四节 早期批评史学者的开拓实绩

早期批评史学者在学科领域内表现出了勇于持异的开拓精神。他们共同着一块学术园田，却很少见到有因袭的足迹。从他们的创获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振奋的主体创造精神。而学术停滞时期的景象则是可悲的，无休无止的低水平重复，毫无价值的学术游戏，作茧自缚的封闭心态，动辄得咎的文化氛围。与此相反，早期的批评史研究正处在一个新旧文化交替、更新的大背景之中。求真、求新，是彼时的一种学术风尚。他们的艰辛开拓对批评史研究作出了各自的创新贡献。多视点的观照、多层次的开掘，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实绩可观：

一是宏观式的概论。如刘永济的《文学论》（1926年四版）。其特点是以中国传统的文艺观为主干，时时参照着域外的文艺观念。作者的哲学意识颇强，重视把中国的文艺思想放在一

^①《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第5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个总体的文化背景中来考察的。

一是提纲式的历史批评。这可以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为代表。该书的特点是简约,是后出批评全史格局的先导。

一是注重各个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概念辨析。如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即是。该书的史料引证堪称精审,究其原因,就因为凡所引的材料都是作者经过仔细辨析探源过的。作者积七、八年之功而成此书,可见学风之严谨。

一是点化式的全景批评史。如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1934)就是。作者虽以史的线索为经,但本旨是在揭示各时代批评家的特殊贡献或独特主张。所标举的特色,多是作者直接的体验。文如其人,此书中时时透现出作者的个性。

一是断代批评史。如罗根泽的批评史论著。现在我们看到的三册《中国文学批评史》,实际上都是断代史的合编。作者先写了《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1934)、《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1943)等四部断代史。至于《两宋文学批评史》是由郭绍虞代为整理的遗稿,出版在解放后。求真、求深,是作者的追求目标。特别是全书的绪言,既是作者对批评史编纂的全面探索,又是以前批评史编纂的一个理论总结,至今读之,仍有价值。

一是远略近详的全史。如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大纲》,作者有感于著述界“好古”气氛甚浓,批评史著述往往前详后略,看不到唐宋以后史论。这样把11世纪以后的一大片空白及时地填补了起来。作者强调史观,善于择别,勇于判断,时有创获。

以上列举的几种类型的批评史及其在研究方法上的开拓,基

本上反映了早期批评史研究的面貌。早期批评史学者在研究中的独立性甚强。开垦处女地是艰辛的。许多学者都是一边从故纸堆中爬剔、梳理史料，一边锻铸着研究的工具。他们对于前人已经开掘过的领域，则舍得化力气继续掘深，不到喷出一泓清泉不肯罢休；他们对时人未曾开掘过的领域，更是充满着一种自我作古的勇气，终于使这门学科在不断的开拓中崛起，并且奠定了它的基本格局。

人予历史以新的生命，历史予人以新的使命，但历史同时也给人带来了新的局限。早期批评史研究也不例外。在当代科学文艺观的光照下，这些局限已为人所共见。然而它曾经有过的光荣的革新历史，却往往为人所健忘。前辈学者为后继者砌好了最初的前进台阶，而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又何尝不是在给后来者增添新的阶石呢。所以，本文并不愿对他们作非历史主义的苛求，且以控制论思想家维纳的一段话作为本篇的结语：“有趣的是可以看到，每种工具都有自己的世系，而且总是用上一代的各种工具制造出来的。从18世纪钟表匠的车床开始，经过各种过渡性的工具，形成一个清晰的历史链条，然后才变成现代的大型塔式车床。”^①

①《人当作人来使用》，《维纳著作选》第127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第二章 在当代学术背景下的新拓展

今天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怎样看待古代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呢？我认为，首先，对过去的理论的研究范围应该扩大和深入……

——郭绍虞：《关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79）

第一节 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化趋势

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并非总是一成不变的。同一门学科的研究者也因其对研究对象和范围的见解不同而分成若干学派。更何况新时期的古代文论研究正面临着走向世界的学术大势。

金克木指出：“人类的文化遗产并不能为一个民族所独占，现代各门学术都国际化了。”^①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与世界文

^①《印度文化论集》第2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学交流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一千一百多年前。公元9世纪初叶，日本僧人空海在结束他在中国的三年留学生涯后，携回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等中国诗学论著回国，十年后编纂成《文镜秘府论》，可以说是中国诗论移植日本文苑后开出的第一枝奇葩。日本学术界长期重视六朝和唐代文学（自然包括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传统源头直可推到《文镜秘府论》的问世时期。近几年来，日本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范围日渐扩大，时有新作论著被译介到国内，这是为研究者共睹的事实。中国诗论介绍到西方，不过是近半个世纪的事。据研究者考证，中国诗话最早的英译是发表于1922年9月号《日晷》上的《沧浪诗话》（节译）。译文前冠有当时美国文论权威斯宾加恩的序言，认为《沧浪诗话》“在八个世纪之前就预示了西方世界关于艺术的现代概念”，并将“别趣”、“别材”之说与克罗齐直觉论比较，指出中国把艺术独立于哲学、伦理、宗教的思想比西方早得多。^①斯宾加恩的这一观点，至今尚不失其学术价值。

尽管目前大多数的西方文论家对中国的文论传统了解不多，可是要求理解这一传统的学者、特别是比较文论家却愈来愈多了。王文生说：“他们甚至认为，不研究中国文论，则所谓比较文论、一般文论的研究远远够不上是充分和完备的。”^②没有中国文论这支参照系，比较文论研究无疑会留下一片令人遗憾的空白。文化背景的不同与语言的障碍使许多研究者在这座辉煌的文

①赵毅衡《远游的诗神》第12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所引译文亦为该书作者译于原著。

②《比较研究发现自我》，《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

论宝库面前却步不前。这正如已故华裔美国学者刘若愚说的：

“一个现代批评家，不管其国籍所属，只要在世界性的范围内研究中国文学，就不难发现把任何传统的中国文学理论作为批评的必要或充分基础，都很难如愿以偿。因此，对中国和西方的批评概念、方法和标准加以综合，实属必要。虽然在这方面已成效初见，但还需要更多努力；其先决条件是更好地理解传统的中国文学理论。”^①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钱锺书《管锥编》出版以后，

“国外对此书的反应非常热烈”，“西欧、北美和日本的学者特别是汉学家对此书兴趣尤浓”，“美国的哈佛大学中文系有一个研究小组专研《管锥编》”。^②学贯中西的作者至少为他们架起了一座走向中国古代文论宝库入口的桥梁。我国的古代文论研究者理应顺应当代中、西文论交流的学术大势，为中国古代文论的走向世界迈出新的一步。全面地、科学地揭示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内容及其民族特点，无疑是一项最重要的基础工作，这也是古为今用的前提和先决条件。不管运用何种研究方法和手段，首先必须尊重古代文论的历史本来面目。进行中外比较，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并非要求研究者仿制出一具与西方文论完全复合的中国古代文论框架，相反，应该揭示出两者之间客观存在的同中之异，否则不就失落了中文论在世界文论中的历史位置了吗？进行古今比较，运用行之有效的传统研究方法，也并非要求研究者仅仅满足于古物的复活或陈列，相反，应该对古代文论作出新的科学解释，新的价值发现，否则，文论遗产不正是成了

①《中国的文学理论·绪论》，《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②《〈管锥编〉研究论文集》第7页，第43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